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の過去と現在——糖業移民村を視座として》書籍評介

曹惟晴*

一、前言

隨著文化資產保存的提倡與觀光事業的發展，修復並重新對大眾開放的日治時期建築越來越多，但是它們的「重生」未必都是理所當然且順遂的。其中，日治時期神社的重建與再利用，容易涉及國族理念而成爲爭論對象。近期，作爲桃園忠烈祠使用的桃園神社遺址，因迎來日本祭神而引起軒然大波，後續更演變爲「強制送回日本神明」事件與其他政治紛爭。於此之前，2015 年日人捐款重建的高士神社，也曾因爲日本式的祭祀儀式而引發爭議。這些神社遺跡再利用的相關事務，往往只能藉著爭端，短暫躍上討論版面。然而，對地方來說，他們如何看待神社的存在、重建與發展？我們又可以如何理解日治時期遺留的數百座神社遺址？除了探究這些包含神社在內的舊建築存在於日治時期的意義，我們還能如何從現有狀態去認識它們對於當今社會的意涵，以及其承繼的過往？

野口英佑稟持著「希望能將日本人還不熟知的臺灣帶回日本」的想法，曾經來臺灣交換留學，並在查閱政府檔案、進行口述訪談之基礎上，完成由其博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學生

來稿日期：2023 年 7 月 10 日；通過刊登：2024 年 2 月 26 日

士論文修訂而成的《台湾における「日本」の過去と現在——糖業移民村を視座として》。¹本書聚焦於臺東鹿野，旨在探索現代臺灣社會中的「日本」是什麼樣的存在，並認為單憑「親日」一詞無法完全解釋近年大量修復、重建日治時期建築的現象。全書以鹿野村社為核心，先是描繪出鹿野村作為糖業移民村的歷史以及該地重層的移民結構，後在口述訪談的基礎之上，探討兩次鹿野村社重建計畫經過，以及不同單位、不同群體面對神社重建一事，支持或抱持異議的表面意見（建前）與真實想法和渴望（本音）。最後，則兼論另一個日治時期建築——鹿野區役場的修復，論及當代社區營造政策與文化資產間的關聯，並分析較晚移入的社群如何利用歷史建物修復，找到自身與土地的連結，同時強化當地社群連帶。

二、本書內容大要

「親日臺灣」的印象如何產生？戰後政治環境的狀態，使得曾接受日式教育的「日本語世代」長者們懷念、訴說對日本統治時代的記憶。日本人也受到大眾媒體的影響，認為相較於韓國，臺灣人對於日本統治的過往抱持更加肯定之態度，因而形塑出日本人心目中「親日臺灣」的樣貌。

2015年，臺東鹿野的龍田村重建了日治時期的神社，該神社不僅是首座原地重建的神社，此次工程也是臺灣木匠與日本宮大工（主要從事神社、佛寺建築的木匠）首次合作。然而，該神社所在地過往是以日本移民為主的糖業移民村，日本人在戰後悉數被遣送回國，再加上當時調查顯示臺灣東部的親日程

1 野口英佑，〈あとがき〉，《台湾における「日本」の過去と現在——糖業移民村を視座として》（東京：ゆまに書房，2023），頁195-200。

度相對較低，鹿野村社重建一事似乎難以用「親日臺灣」的說詞直接涵蓋。因此，本書旨在於分析日治時期建築物被再利用的經過，試圖提出過往研究大多忽略的臺灣社會如何定位「日本」的觀點。

爲了釐清神社重建過程當中的「人」，作者從族群與糖業發展史的角度切入第一章，並由臺灣整體逐步聚焦於臺灣東部，勾勒出日治時期鹿野村到戰後龍田村的歷史發展，以及「鄉」層級的族群複雜性。漢人在1880年前後曾於鹿野村一帶短暫進行開墾，而後基於疾病與族群關係等因素離去。此間置的「空白場所」成爲日治時期當局興辦官營移民的候選地之一，唯受成廣澳事件影響而作罷。直到1913年臺東製糖株式會社成立，該會社爲了穩定取得製糖材料來源方才招募日本移民。此外，被完備公共設施吸引、遷居的漢人則多居住在外圍，僅少數知識分子或與當局關係密切的漢人得以居住於日本人區，而他們在戰後也多扮演地方發展的要角。戰後，日本人被遣送回國，鹿野村則爲臺糖接收，改爲鳳梨栽培事業區，來自其他地區的「二次移民」湧入當地，原日本人居住區周邊亦被重新劃分爲今日的龍田村。1960至1970年代，從都市回流鄉村的「新移民」則與前述日治時期以降的居住者、「二次移民」，共同構成了三層的住民結構。當地如同臺灣縮圖一般，有著複雜的重層移民社會。在此脈絡之下，作者將接續討論：日治時期以來的歷史連續性以及當今人們對於日本的想法，如何影響戰後現地社會的政治過程？

第二章著眼於鹿野村社的歷史與戰後最初的重建計畫。鹿野村社於1921年由日本移民所建造，1931年遷至現址，並在「一街庄一社」的政治原則之下，逐漸演變爲於各祭典日動員機關人員、學生等的場所。在2000年代初次重建計畫之中，地方政府（鹿野鄉公所）注重地方觀光經濟振興，站在希望重建神社的立場。而中央政府（交通部觀光局）則重視文化資產保存，認爲貿然重建可能有違神社最初樣貌，要求重新檢討。在此情況下，未能落實該重建計畫。其後，仙人掌鄉土工作室作爲鹿野鄉最早設立的地方文史工作室，以文

化歷史為社區發展的行銷手段，並在神社跡地旁的崑慈堂內設立「龍田文物館」。儘管如此，這個民間組織並未能對神社重建計畫產生實質影響。

第三章接著討論沉寂許久之後重新萌生的第二次重建計畫。2011年，時任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縱管處」）處長陳崇賢，表面上試圖透過日本建築營造「日本味」，讓日本觀光客移動到花東縱谷區旅遊，然而其提出重建鹿野村社想法的同時，也承載著自身觀看日式宿舍的記憶與相關職務經驗的個人動機。陳崇賢深知重建事宜的落實，必須建立在行政與居民考量一致的基礎之上。當地居民依照移居時間而劃分為三個群體，不同身分影響著他們各自的立場。日治時期居住者後代因具年幼時期的記憶，對於神社原貌重建相當執著；「二次移民」信仰中心崑慈堂的管理委員會，時常扮演與行政單位折衝的角色，但他們對重建鹿野村社等日治時期歷史沒有太大興趣；「新移民」群體則是支持鹿野村社重建且高度關心的一群。然則，陳崇賢所交涉的當地住民僅限於地方上具有村內行政代表性質的崑慈堂管理委員會，忽略了另外兩個群體，這也將成為計畫後續波瀾的伏筆。

重建工程開工之後，承包商基於神社殘存臺座耐久性與安全性不佳，提議破壞重建，招致當地居民反對。在此背景之下，第四章聚焦於政府單位和當地各個住民群體之間的折衝。日治時期居住者後代執著於恢復神社樣貌，在新移民社群邀集記者記錄之下，臺灣社會輿論傾向支持龍田村居民，使縱管處無法輕易拒絕當地住民意見。面對臺座施工問題、居民數度陳情以及不利報導，縱管處致力於透過協議會與說明會，與當地取得共識，繼續完成重建計畫。細究行動者言行背後，可以看見「新移民」社群表面上強調守護神社的歷史意義，實質上還多了一層藉由媒體將自身與日治時期居住者子孫一同定位為「重視鄉土歷史文化的住民」，從而達到將自我認同視覺化之意義。而代表村民簽署陳情書的鄉民代表，也有著展現廣納民衆意見、以較高政治權力調停事務之目

的。綜合上述，鹿野村社的重建是中央、地方政府、鄉民代表、當地住民在各自立場上所形塑出的成果，不僅展現不同居民群體的意見與目的，也呈現出整個折衝過程受到日治時期以來的歷史延續性影響。

作者於第五章將討論對象轉向鹿野地區另一個日治時期建築的修復。與神社同在戰後成為「空白場所」的鹿野區役場，以「新移民」為主力，在沒有行政機關補助下重新被利用。在「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之下，文化資產往往扮演著將地域固有歷史可視化的重要角色，藉由解釋過去形塑當地自我認識，唯若考量國民統合目的與資金來源，由當地住民推動修復的案例實屬少見。修復鹿野區役場的參與者多半為外部人士，「新移民」社群將此現象歸咎於村內農忙，不過作者卻認為這是因為「二次移民」與「新移民」社群之間有著微妙的距離感。為了與現居的土地產生連結，新移民利用了糖業移民村的歷史建築物，藉由歷史連結強化自身社群連帶，並試圖重新定義正面的自我形象，加深自身居住於龍田村的「正統性」。

綜合前述各章的討論，鹿野村社與區役場的修復，顯示了臺灣人對日治時期建築認識的多樣性。作者指出：過往研究臺灣社會當中對日認識的相關討論，似乎都在追求某種「日本」的意義，但就鹿野龍田村案例來說，臺灣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對日認識，未必都有著特殊意義，有時候僅僅是「恰巧」與日本殖民的歷史產生連結。另一方面，神社等建築的重建門檻頗高，中央政府在權力與資金上握有優勢，對最終決定具有相當影響力。而今後的課題將會是：人們將如何利用重建、修復完成後的日治時期建築？對此，作者另闢一章補論進行探究，呈現出重建期間未積極參與的人們，在完工之後以各自目的接近鹿野村社的樣貌。

三、本書特色與主要議題討論

本書運用既有研究以及鹿野鄉志等論述，勾勒出鹿野村社以及其所處的日本移民村在戰前與戰後的歷史發展，也利用縱管處等官方檔案，重建政策形塑的發展過程，並在這些基礎之上進行口述訪談，重構出鹿野村社與鹿野區役場兩座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建築遺跡，在當代社會裡被重建的社會脈絡。本書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這些代表著臺灣島上「過往日本」形象與意義的歷史建築，與今日臺灣社會裡的「日本」印象如何產生連結？作者從日本人的角度切入觀察，反思「哈日」的現象是否能夠用以理解涵蓋神社在內的日治時期建築之重建。顯然，在鹿野村社以及鹿野區役所的實際案例之中並非如此。縱使神社重建計畫在表面上有著以日籍觀光客為導向的政策方針，其本質上仍舊有著主事者的個人動機、各群體的目的，以及被用以當作說服工具的實質利益（頁83-96）。

作者依照時序深刻闡述了一個日治時期神社被重新建造的過程，包含最初的規劃、被中央駁回、再次萌芽的計畫與其背後的來歷，以及重建工程中的困境和完工後的利用情況。初看章節安排，會以為地方政府和民間組織的神社重建計畫（第二章）與中央政府的神社重建計畫（第三章），所反映的是不同立場的人們各行其是。然而，雖然兩次的重建計畫各有其主導者，但就實際過程而言，官方、民間的各個群體皆參與其中。

本書的特色之一在於：作者透過史料爬梳與口頭訪問成果，細緻地還原重建過程當中的變化、發展及其歷史意義。由於書中主要討論神社的重建，相關事件發展多在二十一世紀以後，時間距今相當近，較容易找到當事人以及多樣身分背景的群眾進行口述訪問，還原其各自立場。儘管如此，鹿野村社重建計畫源頭之一的時任縱管處處長陳崇賢已於2019年春過世（頁197-198），考量到陳處長於2013年5月辭任公務員職務（頁98）之後，才更有機會將最初發

想的動機與策略告訴訪問者，因此本書作者對其從事口述訪談，不僅為我們留下幾近第一手的描述，更可能是唯一相關紀錄。除此之外，作者訪問的對象也涵蓋了其他居民社群以及當地的組織等，對事件始末及當地特性，同樣具備了一定程度的掌握及理解。

另一方面，過往研究肯認鹿野村社作為臺灣第一座重建日本神社之例的歷史意義，也提出重建事宜係經過當地官民雙方認可，由作為地方政府的鹿野鄉公所主導。此外，該研究當中也從施工爭議的相關報導，指出縱管處在重建工作內的涉入，及其重建過程中強調高標準復原的原則。² 本書進一步將相關討論延伸至神社重建背後，不同單位（中央、地方、廟的管委會、民衆）、不同群體（政府官員、日治時期居住者後代、二次移民、新移民）的角力和互動，凸顯不同立場的人們擁有不盡相同的理想與目標，反映出重建歷史建築過程所具有的「工具性」，以及前述單位與群體之間，如何在神社重建事宜下形成網絡，實屬其另一大特色。

本書第三個特色則是透過鹿野的案例，帶著讀者重新思索近期臺灣如雨後春筍般修復、開放日治時期建築的意義。但是，糖業移民村內神社的特殊性以及鹿野地區個案所展現出當今臺灣的對日認識是否得以涵蓋整體社會狀況，似乎還有一些可討論的空間。參酌與本書內容相關的既有研究，筆者認為沿著「鹿野村社的重建具有何種時代意義」，有幾個方向可以深入討論。

（一）鹿野村社展現的日本統治下海外神社的遺留、記憶與重塑

就「臺灣當中『日本』的過去與現在」此一命題，我們可以如何定位被作為核心討論對象的鹿野村社？其歷史意義與當今重建的涵義為何？

2 林承緯，〈神社遺跡與文化資源〉，《台灣民俗學的建構：行為傳承、信仰傳承、文化資產》（臺北：玉山社，2018），頁228-232。

長期研究日本國家神道與海外神社的學者中島三千男，曾指出海外神社具有兩個角色。一為是由移居海外的日本人，在環境嚴苛或是尚未適應之地生活，爲了祈求自身生活安穩，或是維繫自己作爲日本人的自我認知等需求而設置的神社；二為由日本政府或軍事組織在外地所設置，作爲地域統治象徵的神社，且從一開始便帶有教化的目的性。原先兩者並無多大關聯，但在1930年代之後，變成以國家設置的神社爲上位的一體關係。³對照鹿野村社的過往，可以確知其由海外居留民所建造，最初係因應糖業移民需求而自主設立，唯在「一街庄一社」的原則之下被國家神道體系吸納，成爲所屬於鹿野地區的神社（頁53-55）。也就是說，鹿野村社在日治時期的國家神道體制之下，雖然曾扮演動員人群的空間，其重要性仍遠比不上殖民時期由當局直接設立的神社設施。不過，相對於戰前，鹿野村社的特殊性更能夠展現在它的重建，及其爲當地居民記憶和重塑的面向之上。

中島三千男將海外神社遺跡的現況劃分爲改變、放置、重建、復活四種類型。「改變」係指神社遺跡被後人加工，又或是僅殘存一部分、完全不見蹤跡等與原初樣貌相異的狀態；「放置」是神社遺跡未被加工而以原樣被閒置的情況；「重建」強調戰後曾一度被荒廢過一段時日，並在1980年代以降被重建的神社；「復活」則是指涉伴隨著日本的戰敗，被改作神社的設施恢復原先功能。⁴在本書的案例當中，鹿野村社的現況屬於此分類中的「重建」（頁51），是在被包裝成有助於振興觀光的樣態之下，與其他人群互動而產生的最終樣貌。

然而，扣除日治時期居住者後代以及帶有個人動機的時任縱管處處長陳崇賢之外，其餘群體所看重、強調的並非鹿野村社本身作爲日治時期建築的特

3 中島三千男，《海外神社跡地の景観変容——さまざまな現在》（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13），頁19-20。

4 中島三千男，《海外神社跡地の景観変容——さまざまな現在》，頁34。

性，反倒是觀光經濟、產生在地連結等工具價值。在此情況之下，我們應該怎麼理解日治時期由海外居留民所設置的神社如何被人們記憶、重塑？武知正晃著眼於日治時期建築物，並描繪被「消費」的神社與日式建築，指出在教育、國際交流、商業設施之中，往往將日式建築與神社視作日本文化象徵加以運用，甚至出現了廣泛使用朱色鳥居的在地化現象。⁵神社形象對多數臺灣民眾來說是日本文化的標誌，雖然無法使遺留在過往殖民地當中的神社成為見證日本殖民支配的空間，但是，涵蓋鹿野村社在內的日治時期建舊建築，之於當今臺灣社會的意義，是將「日本」的象徵和對「日本」的認識更加「在地化」與「當下化」的。

（二）日治時期神社等舊建築遺跡的再利用

戰後政府徵用包含神社在內的日治時期建築，其中神社多被當作紀念革命烈士與抗日英雄的忠烈祠使用，此類建築物的保存與再利用要等到1985年桃園神社保存事件之後，才連同文化資產保存一同被重視（頁47-51）。除了圍繞在鹿野村社重建過程裡文化資產／觀光經濟的立場交錯以外，作者在第五章裡提及兩種截然不同的再利用取向，分別為鹿野村社代表的上而下重建，以及鹿野區役場採取的下而上修復。不同途徑涉及了資金問題、地方社區營造以及族群歸屬感的建立。

2000年代第一次鹿野村社的重建計畫應歸屬於上而下的模式，是以在著眼經濟振興的地方政府和持文化資產保存觀點的中央政府之外，以地方文化歷史進行社區發展的民間組織似乎無實際影響重建的能力（頁66）。在鄉土工作室及各個居民社群代表者之外，在地文化資產修復過程對潛藏於其中的其他個

5 武知正晃指出即使朱色鳥居可見於日本的神社，但並非所有的神社鳥居都使用朱色，唯獨其觀察到臺灣商業設施中所採用的鳥居清一色選用朱色，故將此景視為日本文化於臺灣被在地化的一個象徵。武知正晃，〈台湾における日本時代の建築物を見る眼差し——近年なぜ神社の「復興」が目立つのか——〉，《非文字資料研究》13卷（2016.9，神奈川），頁42-47。

人來說具備了何種影響力，以及如何從鹿野的案例汲取經驗，加深史蹟與當地人群之間的連結，仍是有待進一步討論的課題。

另一方面，撤除仍舊被閒置的空間，現存被重新利用的神社遺址大致轉用為四種型態：忠烈祠、公園或觀光用的建築遺跡群、仿照原樣重建的神社、其他紀念方式。竹山神社的社殿在九二一地震倒塌之後，現在的紀念方式是在該區域內以「意象」保存，同一個空間當中仍舊維持著公園的形式，在筆者自攝的照片當中（圖1），仍可清楚地見到再造意象的藝術品後方是兒童遊具。同樣曾作為遊憩空間使用，竹山神社卻發展成與鹿野村社不同的形式。而桃園忠烈祠中日式的神社建築如何與中華式的忠烈祠祭祀相容，亦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⁶



圖1 竹山神社現況一隅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2022.12.17）

6 詳細討論參見林承緯，〈忠魂祭祀設施與異國信仰園區並存共生的可能：以桃園神社遺跡為例〉，收入蔣竹山主編，《物、空間與歷史記憶：2020桃園學》（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2021），頁86-87。

作者以鹿野龍田村的例子，讓讀者意識到日治時期舊建築遺跡再利用的背後，是諸多立場互動而產生的結果。然而，面對不同型態的神社現況，鹿野村社重建案例背後的邏輯可否類推適用於討論臺灣當今社會的對日認識？移民自建的神社與國家力量建造的神社，各自留下的記憶是否有哪些差異？如竹山神社營造的小型紀念意象一般，既非文化資產，亦不著眼於振興觀光用途，此種存在於臺灣的另一種「日本的現在」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又與何種在臺灣的「日本的過去」相互承繼呢？不僅本書提及的重建案例能展現當今臺灣社會的對日認識，其他各式模樣的神社現況也承載著當地社會對於日本殖民時期不同的記憶型態，值得我們繼續探討。

四、總結

綜觀全書，作者達成了自身試圖闡述一段「日本人還未認識的臺灣」之目的，亦即臺灣近來積極重建日治時期建物，並不單只是基於親日情感。聚焦在鹿野村社的案例之上，本書呈現出不同人群、立場的角力過程，就算是生活在當下的臺灣人，也多半對這段過程不甚熟悉。

從地方角度探究包含神社在內的日治時期建築，對世居當地的民衆來說，是牽涉到幼年回憶與家族過往的場域；對新移居者而言，是拉近自身與在地的良好媒介；就行政單位的立場，則可能涉及了觀光、經濟等更廣泛且實用的面向。若將目光擴展到臺灣各地的舊神社與建築遺跡，除了重建與挪用的建物之外，還有許多被閒置的場所。因此，我們仍須關注：如何理解這些日式建築的過去、詮釋它們在當下變遷，進而思索其未來的意義。

引用文獻

1. 中島三千男，《海外神社跡地の景觀変容——さまざまな現在》。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13。
2. 林承緯，《台灣民俗學的建構：行為傳承、信仰傳承、文化資產》。臺北：玉山社，2018。
3. 林承緯，〈忠魂祭祀設施與異國信仰園區並存共生的可能：以桃園神社遺跡為例〉，收入蔣竹山主編，《物、空間與歷史記憶：2020桃園學》。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2021，頁65-87。
4. 武知正晃，〈台湾における日本時代の建築物を見る眼差し——近年なぜ神社の「復興」が目立つのか——〉，《非文字資料研究》13卷，2016，神奈川，頁39-62。
5. 野口英佑，《台湾における「日本」の過去と現在——糖業移民村を視座として》。東京：ゆまに書房，2023。